

略论蜀与滇的文化关系

黄剑华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四川 成都,610041)

[摘要]我国西南地区部族众多,是典型的多民族地区。蜀与滇因为地域相邻,自古以来就关系密切。古蜀可能是西南地区最早创建的一个联盟之国,或称为宗主国。春秋战国时期,古蜀国的东方有巴国与楚国,北方有秦,这些都是当时势力比较强盛的列国。而在同时期的西南夷区域,夜郎与滇等依然是小邦,或者是“邑聚”之类的部族。古蜀国通过商贾与周边少数民族进行贸易以获取资源,此类商贸活动既有短程也有远程,产自古蜀国的丝绸、青铜器、巴蜀的盐巴,以及其他很多物品,便通过商贸输入了滇国和西南夷地区,有些物品甚至经过远程贸易辗转贩卖到了南亚和中亚。与此同时,古蜀国成熟而高超的青铜铸造技术,也在商周之后随着商贸传入了滇国和西南夷地区。汉武帝大力经略西南夷,到东汉时期西南丝路已成为重要国际通道;后诸葛亮平定南中,有效地促进了汉族和西南各族的团结与融合,其意义是非常深远的。

[关键词]古蜀;西南夷;滇国;酋邦;南中;地域文化;民族融合

中图分类号:K901.6/G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354(2017)01-0059-20

一、蜀与滇的地域与民族关系

上古以来,我国西南地区就部族众多,是世界东方典型的多民族地区。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中将巴蜀之外的西南少数民族统称之为西南夷,说“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魑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牂牁,名为雋、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又说“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①班固《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中对此也有相同记述,范晔《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也作了相似记载。《史记》《汉书》和《后汉书》中说的是秦汉时期西南地区的情形,结合其他古籍文献记载来看,透露当时大大小小的部落至少有百数个,史料称这些部落首领为“戎伯”,或称为“诸侯”与“邑君”。实际上,西南地区这种小邦林立、部族众多的情形早在先秦的时候就已如此。

古蜀可能是西南地区最早创建的一个联盟之国,或称为宗主国。常璩《华阳国志·蜀志》说:“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与巴同囿。至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是为帝喾〔颡项〕;封其支庶于蜀,世为侯伯。历夏、商、周,武王伐纣,蜀与焉。其地东接于巴,南接于越,北与秦分,西奄峨嵋。地称天府……其山林泽渔,园圃瓜果,四节代熟,靡不有焉。”^②从出土资料看,蜀人确实是一个古老的部族,古蜀的历史是相当悠久的。甲骨文中已有蜀人与殷王朝之间发生战争、朝贡关系的记载。三星堆一号与二号器物坑的年代相当于殷墟中期与晚期,出土的大量珍贵文物中既有典型的蜀文化特征的青铜造像群,又有来自中原的一些青铜尊与青铜罍,还有来自温暖海域的大量海贝,充分说明了殷商时期古蜀文明的灿烂辉煌,同时也揭示了古蜀与中原的联系,以及古蜀和周边区

作者简介:黄剑华(1949—),男,江苏沙洲人,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四川省民俗学会常务理事,四川客家研究中心副主任。

①(汉)司马迁撰:《史记》卷116《西南夷列传》,北京:中华书局校点本,1959年9月第1版,第2991页。

②(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成都:巴蜀书社,1984年7月第1版,第175-176页。

域的文化交流与商贸往来。商周之际,古蜀曾出兵参加了武王伐纣的军事行动,《尚书·牧誓》记述协助周武王伐纣的有“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①这些都是比较大的部族,才有实力出兵参与伐纣。其中的蜀国由于疆域辽阔和物产丰富,其势力显然是当时西南众多部族中最为强盛的。《战国策·秦策一》就说“夫蜀,西僻之国,而戎狄之长也”。^②秦惠王准备伐蜀的时候,司马错分析蜀国的情形,将蜀国的众多部族比喻为群羊,说:“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也。取其地,足以广国也;得其财,足以富民;缮兵不伤众,而彼已服矣”。认为蜀国具有地广财多容易攻取的特点。^③常璩《华阳国志》对此亦有记述。^④

古蜀国的社会结构显然与中原王朝不同,在制度与崇尚方面也有明显的区别。如果按照史学界通常的说法,中原殷商王朝是典型的中央集权统治下的奴隶社会,那么古蜀国在文明早期阶段则经历了由部落联盟到酋邦社会的演进,从而形成了共主政治的局面。蒙文通先生曾精辟地指出:“蜀就是这些戎伯之雄长。古时的巴蜀,应该只是一种联盟,巴、蜀不过是两个霸君,是这些诸侯中的雄长”。“可见巴、蜀发展到强大的时候,也不过是两个联盟的盟主”。^⑤这种多部族联盟的形式,有的学者认为应是一种酋邦式的形态。^⑥巴、蜀作为“雄长”与“盟主”,各自都曾伙并了一些诸侯来扩大境土与势力。在春秋战国时期,“周失纲纪,蜀先称王”,^⑦蜀国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很大的王国了。



图一:三星堆出土的青铜人头像



图二:三星堆出土的金面罩青铜人头像

① 《尚书正义·周书·牧誓》,(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册,北京:中华书局影印出版,1980年9月第一版,第183页。参见王世舜:《尚书译注》,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7月第1版,第112页。又参见江灏、钱宗武译注:《今古文尚书全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第218页。

② 缪文远:《战国策新校注》(修订本),成都: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3版,第91页。

③ 《战国策·秦策一》,参见王守谦等:《战国策全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9月第1版,第84页。

④ (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成都:巴蜀书社,1984年7月第1版,第191-192页。

⑤ 蒙文通《巴蜀古史论》,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8月第1版,第30、31页。又见《蒙文通文集》第2卷《古族甄微》,成都:巴蜀书社,1993年4月第1版,第199-200页。

⑥ 彭邦本:《古城、酋邦与古蜀共主政治的起源——以川西平原古城群为例》,《四川文物》2003年第2期,第18-22页。

⑦ (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成都:巴蜀书社,1984年7月第1版,第181页。

三星堆出土的青铜雕像群,可以很好地揭示古蜀王国的多部族联盟社会形态。三星堆青铜造像群中,那些千姿百态、栩栩如生的青铜人头像(图一),显而易见就是众多部族首领形象的写照。其中有平顶脑后梳辫者,有平顶戴帽或头戴“回”字纹平顶冠者,有圆头顶无帽或将发辫盘于头上或于脑后戴蝴蝶形花笄者,有头戴双角形头盔者,还有头上部为子母口形、原应套接顶饰或冠帽者。从面相特征看,这些人头像大都为浓眉大眼,高鼻阔嘴,方面硕耳,下颌似有短胡直达耳后,显得神态威武,洋溢着粗犷、豪放的风格。其中也有线条圆润、五官俊秀的造型,如一号坑出土的Aa型青铜人头像,其线条柔和的脸庞衬托着杏状大眼和端丽的鼻梁,加上入鬓的双眉和细腻的双唇,显得优雅而又自然,充满了青春女性之美,推测应是群像中的“公主”或巾帼人物。与洋溢着浓郁的阳刚英雄气概的其他雕像不同,显示出了另一种含蓄秀丽之美。但这类雕像在三星堆群像中数量很少,反映出三星堆时期的古蜀王国是一个男性占据统治地位的社会,同时也有一些巾帼不让须眉的人物,在古蜀王国中与男性一样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三星堆还出土有黄金面罩的青铜人头像(图二),黄金在当时是极其珍稀的贵金属,用黄金做面罩,充分表明了这些青铜人头像身份的高贵,可能属于王室贵族阶层。三星堆出土的大型青铜立人像(图三),头戴华美的冠冕,身着龙纹左衽长襟衣,粗眉大眼,方颐大耳,右臂上举,左臂平举,双手夸张地握成环形,赤足佩脚镯立于双层方座之上(立人像戴冠高180厘米,座高80.8厘米,通高达260.8厘米),应该就是“盟主”与“雄长”和蜀王的象征。此外,还有奇特的青铜纵目人面像(图四),体型庞大,眼球突出,双耳极尽夸张,唇吻三重,额际双眉之间有神奇的卷云纹形状又如同夔龙状的装饰物,洋溢着烜赫的气势,根据《华阳国志·蜀志》中“有蜀侯蚕丛,其目纵”的记载,学者们认为很可能就是古史传说中蚕丛王“纵目”的写照,是古代蜀人崇拜的祖先神灵偶像。三星堆出土的青铜人物雕像群,衣、冠、发式各异,表现出不同族类的集合,都是各族类的代表人物。从头像特征看,可能属于同一民族集团,所展示的应是参加盟会的各部落首长、首领的形象。这些青铜雕像,群体性聚集在一起,表现的也可能是蜀王与各部族首领们,正在进行一次非同寻常的重大祭祀活动的情景。



图三:三星堆出土的大型青铜立人像



图四: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纵目人面像

古蜀的历史,文献记载较为简略,见诸于文献记载的,有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等朝代。扬雄《蜀王本纪》就说“蜀之先称王者,有蚕丛、柏灌、鱼凫、(蒲泽)、开明。是时人萌椎髻左衽,不晓文字,未有礼乐”,又说“蜀王之先名蚕丛,后代名曰柏灌,后者名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颇随王化去。鱼凫田于湔山,得仙。今庙祀之于湔。时蜀民稀少。后有一男子,名曰杜宇,从天坠止。朱提有一女子名利,从江源井中出,为杜宇妻。乃自立为蜀王,号曰望帝。”后来有鳖

灵,由荆入蜀,因治水有功而取代杜宇,“如尧之禅舜,鳖灵即位,号曰开明帝”。^①这些记述具有较浓的传说色彩,古蜀早期历史也因此而蒙上了神秘的面纱。但三星堆惊人的考古发现,后来又有了成都金沙遗址重大发现,以及在成都平原发现了新津宝墩文化大约有八座早期古城遗址,充分证明了古蜀历史并非子虚乌有。三星堆与金沙村都是举世瞩目的大遗址,特别是三星堆出土的大量青铜雕像,对文献记载中的古蜀传说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印证,向我们真实地展示了当时古蜀社会的繁荣昌盛以及青铜文化的灿烂辉煌。我们由此可知,古蜀是长江上游的文明中心,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都是中华文明的摇篮,其对周边区域的文明发展曾产生过积极而重要的影响。

古蜀经历了夏、商、周的发展演变,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古蜀国的东方有巴国与楚国,北方有秦,这些都是当时势力比较强盛的列国。而在同时期的西南夷区域,夜郎与滇等依然是小邦,或者是“邑聚”之类的部族。范曄《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述东汉时期的西南夷,“在蜀郡徼外,有夜郎国,东接交趾,西有滇国,北有邛都国,各立君长。其人皆椎结左衽,邑聚而居,能耕田。其外又有雋、昆明诸落,西极同师,东北至叶榆,地方数千里。无君长,辫发,随畜迁徙无常”。^②与先前的情形相比,并无明显的改变。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将汉晋时期的夷越之地称为南中,也记述当时仍是“编发左衽,随畜迁徙,莫能相雄长”,^③应该是一种比较真实的情形。根据《史记》《汉书》《后汉书》《华阳国志》等记述可知,滇国是因为当地有滇池而得名,滇池区域也就是滇国的主要聚居区。滇国的东部为夜郎国,相比较而言,滇比夜郎还小。从文献记载来看,夜郎有竹王起源等传说,滇国的缘起与滇王的情况则比较模糊。滇国的北部有邛都国,西部有以洱海区域为中心的昆明国。滇和昆明都是云南古代的主要部落聚居之邦,历史虽久,势力范围则有限,对周边的影响不大,在西南夷地区长期处于默默无闻的地位,一直到了汉武帝的时候,才受到了中原王朝的注意。任乃强先生曾指出,汉晋人统称五岭以南之土著民族为越(粤同),于东越、南越、瓯越、骆越、山越、滇越等地区别称外,又有夷越等名称,认为西南夷是西南诸种民族之泛称,“盖汉晋间人,分南中夷为两大类,主要依靠狩猎畜牧为生活者为‘夷’,已经自有农工商业,为多种经济生活者为‘濮’。称夷者,大都尚停滞于原始社会,称濮者,大都已进入奴隶社会。混言之则为西南夷,分言之则为夷与濮”。汉武帝时期,西南夷中“已经具备国家形式组织者,不过滇与夜郎两国,其次或仅只属原始公社,或且只属氏族集团,或民族聚落而已”。^④其他学者对此也有较多的论述,此不赘述。通常认为,汉代所谓的西南夷,主要指巴、蜀之外的西南少数民族,在族属上包括夷、越、蛮三大系统,例如将氏羌系称为“夷”,将百越系(包括濮或僚)称为“越”,将南蛮系苗瑶语族称为“蛮”等。总体来看,整个西南夷在文化、经济等方面的发展都相对比较滞后。同巴、蜀、楚相比,滇确实是一个弱小之邦,僻居一隅,地沃人稀,邑聚而耕,很容易遭到强邻的侵入。

在汉代之前,滇国就曾遭到楚国的入侵并被攻占。据《史记·西南夷列传》与《汉书·西南夷传》记载,楚国曾派军队扩张疆域,向西南进兵略取巴国、黔中以西的地区,没有遇到什么抵抗,便占领了滇国。“始楚威王时,使将军庄蹻将兵循江上,略巴、黔中以西。庄蹻者,故楚庄王苗裔也。蹻至滇池,(地)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属楚。欲归报,会秦击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还,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⑤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对这段历史也有记述:“周之季世,楚顷襄王遣将军庄蹻溯沅水,出且兰,以伐夜郎,牂牁系舡于且兰。既克夜郎,而秦夺楚黔中地,无路得归,遂留王之,号为庄王”。《汉书·地理志》牂牁郡下颜师古曾注引了《华阳国志》的这段记述,《太平御览》卷一六六与卷七七一,以及南宋叶梦得《玉涧杂书》也都引用了这段记载。后来

①《全汉文》卷53,(清)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影印出版,1958年12月第1版,第414页。

②(南朝·宋)范曄撰:《后汉书》卷88《南蛮西南夷列传》,北京:中华书局校点本,1965年5月第1版,第2844页。

③(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成都:巴蜀书社1984年7月第1版,第335页。

④(晋)常璩撰,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10月第1版,第231页。

⑤(汉)司马迁撰:《史记》卷116《西南夷列传》,北京:中华书局校点本,1959年9月第1版,第2993页。(东汉)班固撰:《汉书》卷65《西南夷两粤朝鲜传》,北京:中华书局校点本,1962年6月第1版,第3838页。

南宋刻印的《华阳国志》版本中,说庄蹻“遂留王滇池”,可能是刻印者参照《史记》的说法而作的篡改。实际上,常璩与司马迁的记述有明显的不同:一、司马迁说庄蹻率军略地是楚威王时,常璩说是楚顷襄王时;二、司马迁说是溯江(长江)以伐滇,常璩说是溯沅水以伐夜郎;三、司马迁说庄蹻遂留王滇,常璩说是遂留王夜郎。司马迁是汉代杰出的史学家,常璩是东晋著名的学者,两人记述当各有依据。在时间上,楚威王系公元前339~329年在位,楚顷襄王于公元前298~263年在位,秦夺楚黔中地置黔中郡乃秦昭王三十年(前277),所以有学者认为常璩记载的时间还是比较准确的。^①《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也记载说庄豪(应是别称,即庄蹻)在楚顷襄王时从沅水伐夜郎,“既灭夜郎,因留王滇池”。^②蒙文通先生曾对庄蹻王滇的史实作过考证,认为蹻、豪同音,蹻为人名,豪则为酋豪的通称。如《尚书·旅獒》郑玄疏引用就说“西戎无君名,强大有政者为酋豪”,《后汉书·西羌传》也有“强者分种为酋豪”之说。徐中舒先生认为蒙文通先生此解“最具灼见”。^③我们由此可知,庄蹻不仅占据了滇池周围地区,也占据了夜郎,建立的统治包括了云南与贵州一带。《盐铁论·论功》说“今西南诸夷,楚庄之后”,^④楚庄就是楚国的庄蹻;《新唐书·南蛮传》说“自滇池夜郎以西,皆曰庄蹻之裔”;^⑤《通典》卷一八七也有“自夜郎滇池以西,皆云庄蹻之余种”的记述。^⑥这些记述都说明了庄蹻的势力范围,将滇、夜郎以及其他一些部族都置于了统辖之下。值得注意的是,文献记载说庄蹻王滇时,“变服,从其俗”,说明了庄蹻的入乡随俗、以便同滇国少数民族和谐相处,有利于加强统治。但随着庄蹻军队的侵入和长期驻守于滇,也带来了楚文化,促进了民族的融合,为滇文化增添了新的内容,这也是不言而喻的。与之相应的是,来自中原与巴蜀的文化也进入了滇国,对滇文化与西南夷地区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古蜀与滇的关系,相互之间很早就有了交往。文献记载杜宇是继蚕丛、柏灌、鱼凫之后的蜀王,就因与来自云南朱提(今昭通)的梁氏女利联姻,壮大了力量,从而称雄于西南地区。扬雄《蜀王本纪》说“后有一男子,名曰杜宇,从天坠止,朱提有一女子名利,从江源井中出,为杜宇妻。乃自立为蜀王,号曰望帝”。^⑦常璩《华阳国志·蜀志》说“后有王曰杜宇,教民务农,一号杜主。时朱提有梁氏女利游江源,字悦之,纳以为妃。移治郫邑,或治瞿上。七国称王,杜宇称帝,号曰望帝,更名蒲卑。自以功德高诸王,乃以褒斜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后户,玉垒、峨眉为城郭,江、潜、绵、洛为池泽,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⑧扬雄与常璩都记述了杜宇和朱利的联姻,可知这是古蜀历史上一件很重要的大事。常璩说的南中就是云南,可见望帝杜宇的蜀国疆域包括了云南很多地方,说明古蜀国的统治与影响已经由朱提而扩大到了南中地区。望帝后来的统治发生了一些故事,先是遭遇了大洪灾,然后重用由荆入蜀的鳖灵为相负责治水;鳖灵的妻子是位年轻貌美的女人,就在鳖灵长期在外治水期间,和杜宇有了私情;这件事情的后果非常严重,杜宇最终由于好色“德薄”而失去了王位,鳖灵取代了杜宇而建立了开明王朝。

杜宇后来的去向也是个非常有趣的问题。有的学者通过对古蜀历史和彝族史的考证研究,认为杜宇失国后,带着追随他的族人流亡到了凉山和云南,现在的彝族便是杜宇的后人。《史记·三代

① (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成都:巴蜀书社,1984年7月第1版,第335-338页。参见(唐)杜佑撰:《通典》卷187,北京:中华书局校点本,1988年12月第1版,第5055-5056页。

② (南朝·宋)范晔撰:《后汉书》卷88《南蛮西南夷列传》,北京:中华书局校点本,1965年5月第1版,第2845页。

③ 蒙文通:《庄蹻王滇辨》,载《四川大学学报》1960年第1期。参见徐中舒主编:《巴蜀考古论文集》,成都:巴蜀书社,1987年8月第一版,第66页。又见徐中舒著:《论巴蜀文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4月第1版,第166页。

④ (汉)桓宽撰:《盐铁论·论功第五十二》,《二十二子》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3月第1版,第139页。

⑤ (宋)欧阳修等撰:《旧唐书·南蛮传》,清代武英殿本《二十五史》第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影印出版,1986年12月第1版,第682页。

⑥ (唐)杜佑撰:《通典》卷187,北京:中华书局校点本,1988年12月第1版,第5067页。

⑦ 《全汉文》卷53,(清)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影印出版,1958年12月第1版,第414页。

⑧ (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成都:巴蜀书社,1984年7月第1版,第182页。

世表》正义说：“周衰，先称王者蚕丛，国破，子孙居姚、嵩等处”。^①蚕丛创建蜀国应在夏、商时期甚至更早，而杜宇的时代大约在西周晚期与春秋时期，这里说的“国破”应是杜宇失去王位之事。姚，即今云南姚安；嵩，即今四川西昌一带，正好是中国西南部的彝族地区。在《爨文丛刻》《且兰考》等史籍中，记载彝族远祖曾世居于蜀地，“周之叔世，杜宇称帝于蜀，蜀有洪水，隆穆避居南方，诸夷奉为君”。在云、贵、川三省彝族民间，从古迄今一直广泛流传着洪水泛滥和仲牟由避洪水的故事。仲牟由是涉及彝族起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我们查阅史籍，《元史·地理志》《大明一统志》《蜀中广记》《天下郡国利病书》《读史方輿纪要》等书，都说彝族是仲牟由之裔。^②汉文献中的仲牟由，在贵州《西南彝志》中称为笃慕俄，地方志中则称祝明，或称隆穆，凉山民间传说称为居木，显然这是同一人名的不同译音和写法。在很多年前的一次学术会上，笔者曾请教一位对本民族历史有着深入研究的彝族学者，其言根据彝族从古至今的口碑流传，仲牟由即是杜宇的彝语音译，彝语又称杜宇为居木，仲牟由是彝族传说中的六祖，从仲牟由开始才形成了真正的彝族，杜宇(仲牟由)有三个儿子，繁衍的彝族后裔有云南一支，贵州一支，四川凉山一支。这说明，彝族对其本民族的起源和形成是很清楚的。通过彝族的口碑文献，使我们对杜宇的去向有了一个清晰的了解，知道了彝族和古蜀的亲缘关系。^③童恩正先生也认为，“实际上杜宇族的最终下落，可能是迁徙到了今四川南部和云南北部一带”。^④由此可知，古蜀与云南少数民族(包括滇国)的密切关系，可谓由来已久。

殷商时期的古蜀国已经有了灿烂的青铜文化，铜矿的开采和青铜的冶炼都已形成了规模，青铜铸造技术也达到了相当成熟的程度。朱提(今云南昭通)是铜矿蕴藏富足之地，朱提以西的金沙江流域(例如今之渡口一带)也有大量铜矿，古蜀国的青铜很有可能就来自于朱提或金沙江流域，将开采的铜矿辗转运输到了蜀国都城，然后再开炉冶炼铸造。古蜀对黄金的开采利用也很重视，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出土有金杖、金虎、金面罩、金璋、金鱼、金叶、金冠带、太阳神鸟金箔饰、金箔蛙形饰、金喇叭形器等种类较多的金器(图五、图六、图七)，有的还刻有神奇绝妙的图案纹饰，说明当时黄金的制作工艺已相当高超。《华阳国志·蜀志》有蜀地产金的记述，但我们知道，成都平原并不产金，产金的地方主要在四川盆地周边的丘陵河谷与西部高原以及金沙江沿岸地区。按照《天工开物》中的说法：“凡中国产金之区，大约百余处，难于枚举”。有山石中所出，有水沙中所出，有平地掘井而得，“皆待先淘洗后，冶炼而成块”。又说“金多出西南，取者穴山至十余丈，见伴金石，即可见金。其石褐色，一头如火烧黑状。水金多者出云南金沙江(古名丽水)，此水源出吐蕃，绕流丽江府，至于北胜州，回环五百余里，出金者有数截。又川北潼川等州与湖广沅陵、淑浦等，皆于江沙水中，淘沃取金”。^⑤由此可知，古蜀国南面的金沙江，川北的嘉陵江、涪江等外都是产金之地。



图五：三星堆出土的金杖



图六：三星堆出土的金箔饰



图七：三星堆出土的金虎

① (汉)司马迁撰：《史记》卷13《三代世表》，北京：中华书局校点本，1959年9月第1版，第507页。

② (明)宋濂等撰：《元史》卷61《地理四》曰“乌蛮仲牟由之裔”，北京：中华书局校点本，1976年4月第1版，第1473页。(清)顾祖禹撰：《读史方輿纪要》卷73《四川八》曰“乌蛮仲牟由之裔”，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影印出版，1998年1月第1版，第498页。

③ 黄剑华著：《天门》，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8月第1版，第81-82页。

④ 童恩正著：《古代的巴蜀》，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4月第1版，第71页。

⑤ (明)宋应星撰：《天工开物》，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76年10月第1版，第336、337页。

关于金沙江产金,《韩非子·内储说上》已有记叙:“荆南之地,丽水之中生金,人多窃采金。采金之禁,得而辄辜磔于市,甚众,壅离其水也,(又设防禁遮拥,令人离其水也),而人窃金不止”。^①这段记载说的是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对丽水产金的严格控制,从中也透露出金沙江流域黄金产量的丰富。后来的《元史·地理志》说丽江的得名,就是因为“谓金沙江出沙金,故云。源出吐蕃界。今丽江即古丽水,两汉至隋、唐皆为越嵩郡西徼地”。^②通过考古发现并参照古籍记载可知,金沙江流域很有可能也是古代蜀人采集黄金的地点之一,很可能在商周时期甚至更早就有古蜀先民于此采金了。古代蜀人在金沙江流域采金的历史,明显是要早于楚人的,三星堆与金沙遗址出土的精美金器在时间上比楚国出土的金币与黄金制品要早数百年,就是显著的例证。到了春秋时期,楚国派军西征,攻取夜郎和滇国等地,很大的一个原因也是为了获取黄金。徐中舒先生就指出,楚国是长江中游江南大国,民食鱼稻,生产并不发达,“它要与中原大国齐、秦、三晋争霸争雄,就必须开发其西疆的黄金以为挹注之资”。^③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庄蹻的政权已控制了丽水,当时的蜀国为了继续获得黄金,是否与之发生过争夺尚不得而知,但“窃金不止”者很可能既有当地人,也有蜀人。徐中舒先生认为,“古代四川丽水地区盛产黄金,成为楚国西向移民的巨大动力”,楚国曾大量移民楚雄万家坝等地,并在楚雄等地设官置吏,来管理黄金的开采和东运,后将黄金作为货币在全国市场上流通,楚国的黄金之多,在世界史堪称空前,与此显然是大有关系的。^④古蜀与楚国通过采金而增添了财富,而长时期持续采金的过程,形成了移民与土著居民的结合,也促使了蜀文化、楚文化对滇文化的渗透与融合,对滇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此外,古蜀国通过商贾与周边少数民族进行贸易以获取资源,也是由来已久的。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说庄蹻王滇之后至秦汉时期,“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笮马、僮僮、髦牛,以此巴蜀殷富”,^⑤记述的便是古代蜀人与滇国、西南夷各族经商的真实情形。此类商贸活动既有短程也有远程,产自于古蜀国的丝绸、青铜器、巴蜀的盐巴,以及其他很多物品,便通过商贸活动输入了滇国和西南夷地区,有些物品通过远程贸易还辗转贩卖到了南亚和中亚。与此同时,古蜀国成熟而高超的青铜铸造技术,也在商周之后随着商贸传入了滇国和西南夷地区。

二、民族走廊与文化传播

我国西南地区的横断山脉是著名的半月牙型文化传播带,童恩正先生曾指出:“从地理位置来看,四川所处的环境也是很有特点的。就南北方向而言,它恰好位于黄河与长江两大巨流之间,亦即中国古代两大文明发展的地区之间,既是我国西部南北交通的孔道,又成为我国南北文明的汇聚之区。就东西方向而言,它正当青藏高原至长江中下游平原的过渡地带,又是西部畜牧民族和东部农业民族交往融合的地方。这种地理位置的特点,就使四川自古就有众多的民族迁徙栖息,在历史上留下了十分丰富的内容”。^⑥徐中舒先生也说过,“古中国西部人民为适应高山峻岭与横断山脉的环境而创制了栈道和索桥”,这种“开辟道路,向外发展”的做法,早在战国之前就开始了。^⑦

从民族史的角度看,我国远古时期就出现了多民族的交流融合。以黄帝为代表的中原部族,通过和炎帝、蚩尤等部族的长期交往、争战、融合,逐步形成了华夏族。后来经过尧、舜、禹时期的发展,继续融合其他很多部族而成为了汉族。文献记载,黄帝就曾和很多部族联姻,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有二十五子,娶西陵氏女嫫祖为正妃,皇甫谧云黄帝立四妃,还娶有次妃方雷氏

① (战国)韩非撰:《韩非子·内储说上》,《二十二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3月第1版,第1150页。

② (明)宋濂等撰:《元史》卷61《地理四》,北京:中华书局校点本,1976年4月第1版,第1464页。

③ 徐中舒著:《论巴蜀文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4月第1版,第207页。

④ 徐中舒:《试论峨山王和滇王庄蹻的关系》,徐中舒主编:《巴蜀考古论文集》,成都:巴蜀书社,1987年8月第1版,第60页。

⑤ (汉)司马迁撰:《史记》卷116《西南夷列传》,北京:中华书局校点本,1959年9月第1版,第2992页。

⑥ 童恩正著:《古代的巴蜀》,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4月第1版,第3页。

⑦ 徐中舒著:《论巴蜀文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4月第1版,第1页。

女、次妃彤鱼氏女、次妃嫫母；又记述黄帝和嫫祖生的两个儿子分别降居江水、若水，为儿子昌意娶了蜀山氏女。^①司马迁《史记·夏本纪》和其他一些古籍则记载了大禹娶涂山氏女（有认为即蜀山氏，或认为涂山在巴郡江州、安徽当涂、会稽山等），^②说明了大禹在治水期间曾和土著部落联姻的史实。由此可知，古代部族之间的联姻是一个源远流长的传统，从炎黄时代就开始了，后来的很多部族也都继承了这一传统。除了联姻，部族之间也会发生争战，两者对部族之间的关系都会产生很大影响。随着人口的发展，或者遇到了生态环境的改变，以及天灾人祸的发生，产生了对远方的向往，或者出于避地而居的需要，常会促使部族进行迁徙。古代民族的迁徙活动，原因较多，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无非两种，一种是主动迁徙，为了今后更好的发展，去寻找和开拓更适合本族生存的地方；另一种是被动流亡或转移，为了逃避威胁与灾难，只有举族迁徙远方。此外，还有游牧民族的生存习惯，逐草而居以利于畜群的繁衍，也促使了迁徙活动的频繁发生。

西南民族走廊的形成，除了地理环境的原因，与古蜀和氏羌的迁徙活动也大有关系。古羌是我国西部最原始的部族之一，学者们认为，我国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大都来自古羌，或者是通过迁徙繁衍，或者是通过与原始土著部落的通婚联姻，与古羌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冉光荣先生就指出：“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羌族中的若干分支由于种种条件和原因，逐渐发展、演变为汉藏语系中的藏缅语族的各民族。研究藏、彝、白、哈尼、纳西、傈僳、拉祜、基若、普米、景颇、独龙、怒、阿昌、土家等族的历史，都必须探索其与羌族的关系”。^③李绍明先生也认为：“古代的氏羌是一大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由于经济条件差异与地理分隔等原因，已形成为今日藏缅语系藏彝语族中的各族。”^④长江和黄河的上游源流处于河湟区域，远古时期生态良好，水草丰茂，曾是古羌的栖息繁衍之地，后来古羌的若干分支向南迁徙，便是经由横断山脉和川滇之间的民族走廊进行的。从考古发现看，甘青地区已发现大量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如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半山文化、马厂文化、齐家文化、卡约文化、辛店文化等，出土的彩陶上的人像大都披发，同从殷商至于秦汉活动在甘青地区的羌人披发相符，揭示了这些遗址和古羌的关系。据《后汉书·西羌传》记载，汉以前在河湟区域居住的主要是羌人，对此也是一个很好的说明。《后汉书·西羌传》说秦献公时羌人“畏秦之威，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出由赐支河曲西数千里，与众羌绝远，不复交通。其后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或为牦牛种，越嵩羌是也”。^⑤实际上，古羌的迁徙，早在春秋战国之前就开始了。这里说的越嵩羌，只是古羌的一支，还有若干分支则分散迁徙到了西南其他地区。著名的羌族史诗《羌戈大战》，便记叙了羌人九支人马分别向西向南迁徙的故事。由于古羌若干分支的迁徙，以及部族之间的往来，彩陶也被带到了横断山脉民族走廊上的很多地方，这方面的考古资料是比较多的。这种民族迁徙，延续的时间非常久长，从远古到秦汉以后都未停止。云南出土的滇文化器物中，有很多斯基泰文化因素，就来自于西北的游牧民族。

古蜀和古代氏羌的关系非常密切，都曾栖居于岷江上游，都有石棺葬之俗。章樵注《蜀都赋》引《蜀王本纪》云：“蚕丛始居岷山石室中”；《华阳国志·蜀志》说：“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死，作石棺石槨，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棺槨为纵目人冢也”。^⑥二十世纪以来，考古工作者在岷江上游发现了大量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存，即与古代氏羌和蚕丛氏蜀人有关（图八）。石棺葬与大石墓在安宁河流域和云南的滇中与滇西北等地也有分布，这种葬俗很显然应来自于古蜀和古代氏羌，是沿着民族走廊迁徙带来的（图九）。考古发现揭示，石棺葬与大石墓的年代跨度较长，大约从战国时

①（汉）司马迁撰：《史记》卷1《五帝本纪》，北京：中华书局校点本，1959年9月第1版，第10页。

②（汉）司马迁撰：《史记》卷2《夏本纪》，北京：中华书局校点本，1959年9月第1版，第84页。参见（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成都：巴蜀书社，1984年7月第1版，第20-21、23-24页。

③冉光荣、李绍明、周锡银著：《羌族史》，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1月第1版，第1页。

④李绍明：《关于羌族古代史的几个问题》，《历史研究》1963年第5期。参见李绍明著：《巴蜀民族史论集》，成都：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6月第1版，第244页。

⑤（南朝·宋）范晔撰：《后汉书》卷87《西羌传》，北京：中华书局校点本，1965年5月第1版，第2876页。

⑥（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成都：巴蜀书社，1984年7月第1版，第181页。

代就出现了,延续至汉晋时代依然流行,这对我们了解古代民族走廊上的民族迁徙与栖居情形是很有帮助的。从文献记载看,战国时期秦惠王派军攻取了蜀国与巴国,古蜀开明王朝覆败后,蜀王子孙分散逃亡,分布于青衣、越嵩、南中各处;有一位王子率兵三万人远徙交趾,就是经由民族走廊,从大相岭经过滇西北和滇中等地,向南进入红河流域并继续远征占领了骆越,建立了政权,称为安阳王。蒙文通先生对安阳王的率众迁徙与立国史事作过深入考证,认为:“交趾之安阳王即蜀开明氏后裔之南迁者也”,“蜀王子孙之处姚、雋间者,显为南迁交趾时之所遗留”;“蜀王子孙之南迁,实为一民族之迁徙,此一迁徙流离之集团中胜兵者三万人,推其不胜兵者当亦不下三万人,则南迁之蜀人略为六万。……则南迁之蜀人于后世越南民族之形成关系至为重大”。^①徐中舒先生认为,“安阳王有兵三万,他由叶榆水进入红河以前,必然是早已远离青衣定居南中”。^②笔者认为,安阳王率领数万部众南迁,在当时交通并不发达,加上沿途要筹集粮食和日常所需的情形下,这样的大规模迁徙活动肯定会延续一个较长的时期才会完成,在迁徙过程中对南中地区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应是不争的事实。



图八:四川茂县牟托石棺葬墓地遗址



图九:西昌凉山大石墓

从考古发现看,越南出土有玉璋等古蜀文化特色的玉器,很显然就与安阳王的率众迁徙有关。四川文物考古研究院的专家和越南考古工作者前些年在越南进行的联手考古发掘中,还发现了与三星堆文化非常相似的璧型器、牙璋等文物,也揭示了古蜀与古代越南之间的文化联系。而从云南出土的青铜器来看,据李昆声先生介绍:“根据近半个世纪的考古资料,云南青铜时代文化分为4种类型:滇池地区、洱海地区、滇西北地区和红河流域地区”,“根据现已掌握的考古资料,云南青铜时代文化分布在全省70多个市县,共约200多个地点,出土的青铜器总数在万件以上”,云南的青铜时代起始于商代晚期,结束于西汉晚期,绵延约千余年。^③考古界大都认为剑川海门口遗址是云南的早期青铜时代遗址,其考古学年代大约在商代晚期或商周之际。剑川还发现有战国、西汉墓葬,楚雄万家坝古墓群出土有春秋时期的早期铜鼓。出土青铜器最多的是在滇池区域,其时代大约从战国延续至汉代。就现有考古资料看,滇池区域青铜器的分布范围,大体东至宜良、路南一带,南到新平、元江,北抵曲靖、东川,西达陆丰。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考古发现,是晋宁石寨山滇国墓,从1955年至1960年先后4次发掘50座墓葬,出土器物达四千余件,1995年对石寨山进行了第5次清理,共清理了36座墓葬,出土了五百多件文物。1956年在石寨山六号墓中发现金印一方,刻有篆书“滇王之印”四字(图十),这和《史记》所载汉武帝元封二年(前109)在云南设置“益州郡,赐滇王王印”的史实相合,可见滇池区域出土的这些青铜器,确系滇人的遗物。^④江川李家山也发现有数量众多的滇人墓葬,1972年发掘了27座墓葬,1991年发掘了59座墓葬,截止2000年共发掘了86座墓葬,出土各类器物三千多件。在呈贡天子庙、曲靖八塔台、昆明羊甫头、安宁与东川等地也相继发

① 蒙文通著:《越史丛考》,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3月第1版,第66、69、76页。

② 徐中舒著:《论巴蜀文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4月第1版,第159页。

③ 李昆声著:《云南艺术史》,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8月第1版,第51-61页。

④ 云南省博物馆:《云南古代文化的发掘与研究》,文物编辑委员会编《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1979),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年11月第1版,第376页。

现有滇文化墓葬,出土了很多器物。此外,滇西地区也发现有很多从战国早期至汉代的墓葬,既有大石墓与石棺墓,也有青铜文化遗址,出土有数量较多的各种器物,其中尤以陪葬器具和兵器之类居多。^①滇西青铜文化的分布范围也很广,西至怒江、澜沧江沿岸,南抵保山、昌宁一带,北达宁蒗、德钦,东至楚雄、禄丰,和滇池区域的青铜文化相衔接。从考古发现揭示的时代顺序来看,剑川海门口遗址是最早的,滇西青铜文化的年代也略早,然后滇池区域的青铜文化发展达到了鼎盛,呈现出由北向南扩散传播的形态。而从中国整体青铜文化发展的格局状况来看,中原华夏地区殷商青铜文化、以三星堆为代表的古蜀青铜文化,在时间上明显要早于云南的青铜文化。如果结合民族走廊与文化传播来作深入探讨,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古蜀国青铜铸造技术的南传,可以看到三星堆青铜文化对滇国青铜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图十:滇王金印(云南晋宁石寨山遗址汉墓 M6 出土)

对于云南青铜器的来源问题,过去曾有人提出,滇池区域的青铜文化是战国晚期楚将庄蹻带来的楚文化,也有学者认为这和四川的巴蜀文化有密切关系。还有学者认为,滇池区域的青铜文化是古代濮人创造的,或认为是濮人文化,或认为是古代越人创造的,反映了我国南方“百越”民族文化特色。^②张增祺先生认为,“滇池区域的青铜文化并非来自楚文化或巴蜀文化。有种种迹象表明,它是在当地新石器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青铜文化,当然不可避免地也受到某些外地文化的影响”。又说“对于滇西青铜器,有的人认为是西北地区氏羌文化的南移,和北方草原文化有许多共同点。我们认为,滇西青铜器同样是在当地新石器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当然也不排斥在其发展过程中外地文化对它的影响”。^③张增祺先生是云南考古界主持发掘滇国青铜器和研究滇文化的资深专家,在专著《滇国与滇文化》中也重申了他的观点,其认为“滇国青铜文化吸收和融合了不同地区和民族的文化精华”,“诚然,任何一种古代文化的形成和发展都不会是孤立进行的,不同地区之间文化上的交流和互相影响也是不可避免的。在滇国青铜文化的自身发展过程中,同样也和周围地区的文化产生过某种联系和互相影响,但这并不等于滇文化来源于楚文化或巴蜀文化,也不完全是因为北方草原文化及斯基泰文化的影响,最后才形成滇池区域发达的青铜文化”。^④张增祺先生强调了滇文化的本地民族特色,也注意到了滇文化和周边文化的相互影响,这是很有见地的。但这种相互影响究竟到什么程度,却没有去深入探讨。



图十一、云南出土的贮贝器盖上人物

- ① 云南省博物馆:《十年来云南文物考古新发现及研究》,文物编辑委员会编:《文物考古工作十年》(1979~1989),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年11月第1版,第277~278页。
- ② 李昆声、张增祺:《云南青铜文化探索》,云南省博物馆编:《云南青铜文化论集》,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3月第1版,第9~10页。
- ③ 云南省博物馆:《云南古代文化的发掘与研究》,文物编辑委员会编:《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1979),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年11月第1版,第376~379页。
- ④ 张增祺著:《滇国与滇文化》,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1997年10月第1版,第23~24页。



图十二:云南晋宁出土的八人乐舞鎏金铜饰物



图十三:云南江川出土的猎鹿铜饰物



图十四:云南出土铜鼓上的三位骑马人物



图十五:云南出土的剽牛祭祀铜扣饰

笔者认为,周边文化对滇文化影响最大的,就是以三星堆出土青铜雕像为代表的古蜀文化。从考古资料看,楚文化的典型青铜器物是编钟之类,这在云南很少发现。云南各族最流行的音乐器物是铜鼓,云南、贵州、广西等地出土的铜鼓数量众多,与楚文化是没有多大关系的,楚文化对滇文化虽有影响但并不显著;中原文化的青铜器物在云南也很少发现,同样说明在汉代之前中原文化对滇文化的影响也不明显。古蜀文化最典型的青铜器物就是青铜雕像和鸟兽动物形象,这在殷商中期和晚期已达到极其娴熟与精美的程度。云南出土的滇国青铜器中,最突出的也是人物雕像,正如张增祺先生所说,许多器物上都雕铸或镌刻有神态各异、栩栩如生的人物图像,就其活动内容而言,有祭祀、战争、狩猎、纳贡、上仓、纺织、放牧、饲养、炊爨、演奏、舞蹈、媾合等场面,几乎涉及到当时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图十一至图十五)。除了大量人物活动场面的雕铸,还有不少动物图案的装饰品,约略计之,不同的动物形象达三十八种之多。滇国青铜器注重人物雕像的青铜文化特色,与三星堆青铜雕像可谓一脉相承。从时代沿袭和传播路线来看,三星堆青铜文化在殷商中期和晚期已极为昌盛,云南的青铜文化在商代晚期与商周之际才出现,云南剑川海门口是滇西青铜器最早的发源地之一,滇西与滇中地区的青铜文化到了战国与汉代才逐渐兴旺,很明显呈现出了由北向南发展的态势。从出土的滇国青铜器来看,战国与秦汉时期,滇国的青铜文化最为发达,明显继承了古蜀青铜文化中崇尚人物雕像的传统与特色。这些状况,充分揭示了古蜀青铜文化进入云南后,开始向滇中和滇西的传播路线。这种传播很可能是渐进式的,可能延续了一个较长的时期,在传播的过程中和本地的少数民族文化相互融合,最终在滇池区域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滇国青铜文化。在青铜器和人物雕像的铸造工艺方面,譬如泥范与失蜡法的采用,滇国青铜器也很明显沿袭了

三星堆青铜雕像的铸造技术与工艺特色。^①崇尚人物雕像,喜爱鸟兽动物的各种形象,在中国各地出土的青铜器物中,只有四川三星堆古蜀青铜文化和云南滇文化最为典型和突出。譬如四川三星堆出土有众多的铜鸟首、铜牛首、铜鸡、蟾蜍等,成都金沙遗址也出土有铜鸟首、金蛙等;与云南李家山、石寨山出土的鸟杖首、铜鼓上的牛、铜鼓上的蛙,在造型上有很多相似之处,由此可以看出两者在文化上的影响与密切关系。在时间稍晚的滇文化出土器物中,还可以看到来自于游牧民族的斯基泰文化的影响,那是秦汉以后才由民族走廊传入云南的,并为滇文化所吸取。

通过西南民族走廊进行的迁徙活动和文化传播,主要是由北向南的迁徙和传播,相关的文献记载在这方面便透露了很多信息,大量的考古资料对此也有充分的揭示。殷商时期的古蜀青铜文化已经非常灿烂,对文化发展相对滞后的西南夷地区自然而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形成了强势的传播与渗透。当时北方的中原青铜文明非常辉煌与强势,但由于地理上的原因,对遥远的南方地区产生的影响并不明显。古蜀灿烂的青铜文化对整个西南地区的辐射与传播,因为地域相邻,又由于民族关系方面的亲缘因素,所以很自然受到了欢迎。这也正是滇文化接受了古蜀文化中青铜造像的强烈影响,也形成了喜爱人物造型青铜文化特色的重要原因。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文化交流总是相互的,但古蜀文化中却很少发现有滇文化的东西,比如祭祀与巫术是南北各民族先民都流行的,而南方少数民族中流行的鸡卜,在古蜀文化中却是没有的,此后也未被巴蜀的民俗所接受。据文献记载,到了西汉时期,南方少数民族的鸡卜才为统治者所知,司马迁《史记·孝武本纪》记述汉武帝灭南越后,了解到南越有“祠天神上帝百鬼,而以鸡卜。上信之,越祠鸡卜始用焉”。^②这也说明了从殷商到汉代在西南地区的文化传播过程中,滇文化一直处于比较弱势的状态,而古蜀文化则比较强势,这应该是一种比较真实的情形。正是在这种情形下,殷商时期的古蜀青铜文化畅通无阻地传入了滇中和滇西等地。到了汉晋时期,蜀地的道教也很快传入了南中地区,为各少数民族所接受和尊崇,成为很多少数民族的共同信仰,这对于由北向南的文化传播情形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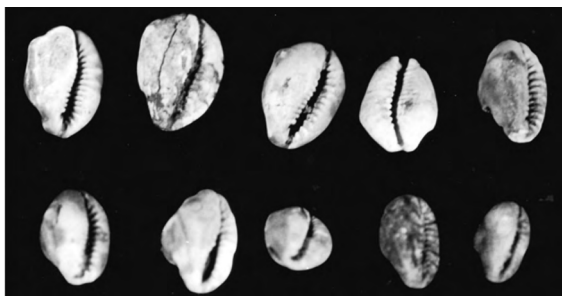
总而言之,从出土的滇国青铜器中,不仅看到了浓郁的本地民族特色的内容,也看到了周边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影响,其中三星堆青铜文化对滇文化的影响最为明显。

三、汉朝统一西南夷与诸葛亮南征

西南地区很早就有了古商道,由巴蜀通向滇越,并进而通向了南亚、中亚和西亚,很可能在先秦时期就已形成。通过这条古商道贸易的主要是产于蜀地的丝绸、蜀布、筇竹杖之类的物品,以及巴蜀的盐巴等。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有数量可观的海贝,大约有数千枚之多(图十六),系来自于太平洋或印度洋温暖的海域,应是远程贸易带来的舶来品。而在云南江川、晋宁等地的春秋晚期至西汉末的墓葬中出土的贝数量更为庞大,据云南省博物馆统计核实,总数有25万枚左右,说明滇国是这些舶来品重要的中转站。三星堆和云南出土的海贝种类有齿贝、环纹贝、虎斑贝、拟枣贝等,这些产于印度洋与西太平洋广阔海域的海贝,可能是带着丝绸等物品外出经商的蜀人将它们带回了滇国和蜀地,也可能是其他地区和其他国家的商人万里迢迢从太平洋或印度洋辗转而来,使这些舶来品作为交易手段进入了滇国和古蜀社会。

① 黄剑华著:《古蜀的辉煌——三星堆文化与古蜀文明的遐想》成都:巴蜀书社,2002年2月第1版,第294-306页。李昆声著《云南艺术史》,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8月第1版,第66-67页。

② (汉)司马迁撰:《史记》卷12《孝武本纪》,北京:中华书局校点本,1959年9月第1版,第478页。《汉书·郊祀志》对此也有记载:“祠天神帝百鬼,而以鸡卜”;参见(东汉)班固撰:《汉书》卷25《郊祀志》,北京:中华书局校点本,1962年6月第1版,第1241页。



图十六：三星堆出土的海贝



图十七：叠溪“蚕陵重镇”石刻,传说即与古蜀蚕丛氏有关

古代蜀地是蚕桑的故乡,也是中国丝绸最早的发祥地之一。古本《淮南子》有“《蚕经》云:黄帝元妃西陵氏始蚕”的记载。^①西陵是黄帝元妃嫫祖的故乡,据学者们考证就在川西,邓少琴先生认为西陵就是蚕陵,在四川的旧茂州叠溪,^②也有认为西陵在现在的四川盐亭一带。^③任乃强先生认为,蜀山氏是最早“拾野蚕制绵与抽丝”的部族,到了“西陵氏女嫫祖为黄帝妃,始传蚕丝业于华夏”。^④文献记载,开创古蜀国的蚕丛也是倡导养蚕的先驱(图十七),宋本《方輿胜览》卷五十一就有“成都古蚕丛之国,其民重蚕事”、“蚕丛氏教人养蚕”的记述,^⑤古代成都还修建了蜀王蚕丛氏祠来纪念蚕丛,将蚕丛王尊崇为青衣神。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立人像,身上穿的那件龙纹左衽大襟衣,无论是其华贵雍容的质地,或是美丽精致的图案纹饰,都给人以丝绸的感觉,这也说明殷商时期古蜀国已有精美的丝绸。正是这些蜀国生产的丝绸,很早便成了远程贸易的重要商品。我们后来说的西南丝绸之路,就是由这条古商道发展形成的。

从文献记载看,古代印度在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这个时期内,已经大量使用中国丝绸。我们从《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摩奴法典》等各种古印度作品中,都可以看到关于丝和中国人的记载。迦梨陀娑的著名史诗《鸠摩罗出世》中,提到了中国丝绸做的皇家旗帜,飘扬在金色的大门上,并在其他诗篇中用迎风飘举的中国丝绸旗来形容国王的心进退不定。^⑥这些记载和描述,说明中国丝织品在古印度贵族中已经普遍使用,丝绸的名声已广为传播。而这些中国丝绸,毫无疑问都来自于蚕桑的故乡——古代蜀地,通过西南丝绸之路这条陆上商道,源源不断地输送到了印度。《史记·西南夷列传》说古蜀商人不仅到了身毒国(印度),还将蜀布与筇竹杖贩卖到了大夏(阿富汗),“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⑦《三国志》卷三十裴松之注引《魏略·西戎传》也说,古蜀商人曾到达天竺和东南数千里的盘越国经商,“蜀人贾似至焉,南道而西极转东南尽矣”。^⑧由此可知,古代蜀人与南亚、中亚等地的远程贸易,确实是由来已久的事情。方国瑜先生认为:“中、印两国文化发达甚早,已在远古声闻相通为意中事。最早中、印往还经过西南夷的交通线,各家所说是一致的,至于取道南海及西域,则为汉武帝以后之事”。^⑨汉代之前,中国的丝绸不仅运销到了印度,还输送到了中亚、西亚等地。古籍记述公元前1世纪罗马共和国的凯撒大帝曾穿着中国丝绸做的袍子看戏,从此以后锦衣绣服的风尚便在罗马流行起来,当时中国丝绸在罗马与黄金等价,只有极少数贵族穿得起。《魏略·西戎传》就记述:大秦“常欲通使于中国,而安息图其利,不能得过……

① 《授时通考》卷72引。参见黄剑华著:《天门》,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8月第1版,第118页。

② 邓少琴著:《巴蜀史迹探索》,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6月第1版,第136页。

③ 王君平、邓漫妮主编:《中华民族的母亲嫫祖》,北京:中国戏曲出版社,2011年4月第1版。

④ 任乃强著:《四川上古史新探》,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4-48页。

⑤ (宋)祝穆撰:《宋本方輿胜览》卷5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线装本,1986年1月第1版第11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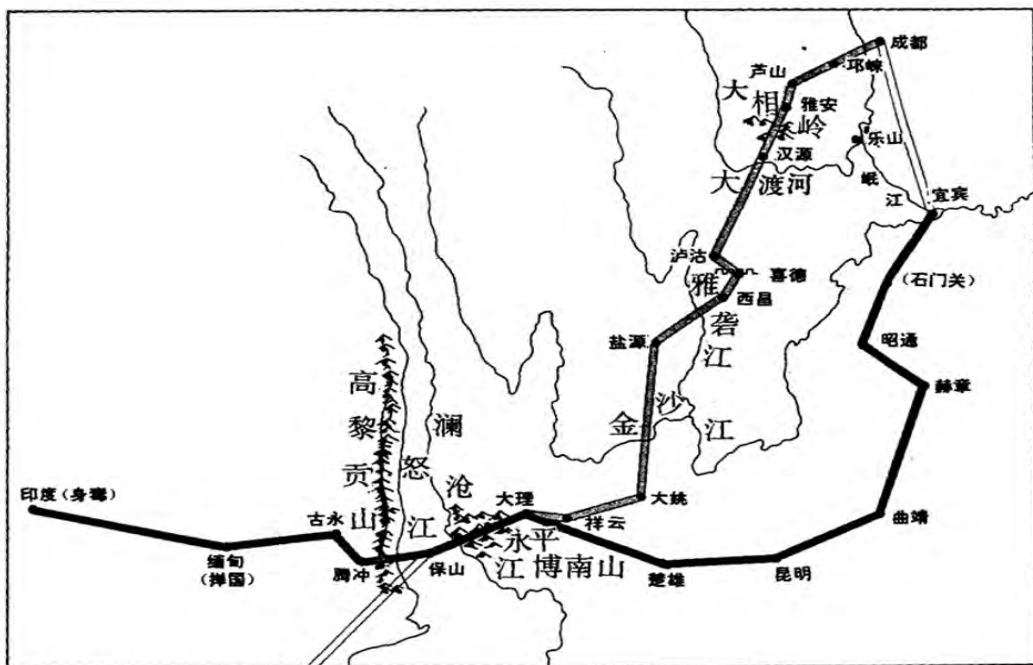
⑥ 江玉祥主编:《古代西南丝绸之路研究》第2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第270页。

⑦ (汉)司马迁撰:《史记》卷116《西南夷列传》,北京:中华书局校点本,1959年9月第2版,第2995页。

⑧ (晋)陈寿撰:《三国志》卷30《乌丸鲜卑东夷传》,北京:中华书局校点本,1959年12月第2版,第860页。

⑨ 方国瑜著:《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10月第2版,第7页。

公元前2世纪,汉武帝出于抗击匈奴的战略考虑,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张骞在历经艰难曲折回到长安后,向汉武帝详细报告了西域的情况,说他在大夏(今阿富汗北部一带)时,见到了邛竹杖与蜀布,这些货物是从蜀地运到身毒(印度),然后再贩运到中亚的,由此推测必定有一条通畅的古道。不言而喻,这条古道就是开辟已久的西南丝绸之路。张骞建议说:“今使大夏,从羌中,险,羌人恶之;少北,则为匈奴所得;从蜀宜径,又无寇”。汉武帝听后大喜,深以为然,但汉王朝对这条商贸古道的具体路线并不清楚。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当即令张骞从蜀郡和犍为郡秘密派遣使者,“四道并出,出駝,出冉,出徙,出邛、僰,皆各行一二千里”,探索通往印度的商道。^③这次行动的结果并不理想,四路秘使都遭到了沿途氐族、笮族、嵩族、昆明族等部落的阻挠。汉武帝遭此挫折,反而更加坚定了决心,采取了更为积极的政治军事手段,开始了经营西南的活动。汉武帝对西南地区的武力经营持续了很长时间,尽管取得了一系列成功,但由于民族关系和商贸利益等方面的复杂原因,只打通了川滇道,滇缅道却一直控制在商人和西南少数部族的手中,造成官方使者未能越过大理至保山一带。到了东汉明帝永平年间,哀牢人内附,东汉设置了永昌郡,西南丝绸之路这条国际商道才终于全线畅通了。汉武帝派张骞通西域,力求打通西南国际通道,虽然其目的主要是出于军事战略上的考虑,客观上却促进了中国同世界的经济文化交流,开启了一个丝路商贸日益繁荣的时代。



图十八：西南丝路示意图

③ (汉)司马迁撰:《史记》卷123《大宛列传》,北京:中华书局校点本,1959年9月第1版,第3166页。

由古商道发展为更加畅通的西南丝绸之路(图十八),对活跃和繁荣沿途地区的经济生活,也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除了成都生产的丝绸和蜀锦刺绣,巴蜀各地生产的蜀布和邛竹杖等手工业品,也是运销到南亚和中亚、西亚地区的备受欢迎的货物。还有临邛等地铸造的铁器,也运销到了滇、黔、岭南、南越和周围少数民族地区。《史记·货殖列传》记载,秦汉时期蜀地临邛是中国西南最重要的铁器生产基地,制作的铁器曾大量销往周边的少数民族地区,如卓王孙“即铁山鼓铸造,运筹策,倾滇蜀之民,富至僮千人”,程郑“亦冶铸,贾椎髻之民,富埒卓氏”。^①《汉书·货殖列传》对此也有相同记载。^②战国至秦汉时期,出现于越南红河三角洲和泰国东北部的铁器,以及在越南北部清化省的东山遗址和广平省的某些汉墓中发现的铁器,可能都是从蜀地临邛输入的。^③还有蜀地铸造的各个时期钱币,也在西南丝绸之路沿途广为流通,近年来发掘出土的数量极其可观。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秦汉时的严道(荥经),蜀汉时的犍为郡,都是重要的钱币铸造基地。1987年3月,考古工作者在西昌市北32公里的东坪村发现了一处汉代大型冶铜铸币遗址,出土有新莽“货泉”铜范、东汉“五铢”铜范、铜锭和大量的矿石、炉渣、木炭等。^④在牦牛道和五尺道沿途,还发现了多处钱币窖藏。这些钱币铸造基地和大量钱币的出土,说明西南丝绸之路对货币的需求量是相当大的,从而也说明了经济的兴旺和商贸的繁荣。在云南境内西南丝绸之路的沿途以及博南道(永昌道)沿线也出土有大量金属钱币,据王大道先生统计,总数有1万多枚。^⑤这些钱币也大都是在四川铸造,然后沿着西南丝路川滇段的走向而流入云南。在四川彭山等地的崖墓中,还出土了摇钱树,在西昌等地也发现了摇钱树的枝叶,在昭通、呈贡、大理等地的汉墓中也有发现,反映了东汉时期西南丝绸之路沿途地区的拜金习俗,也揭示了这种葬俗由蜀向滇的传播。这方面的考古资料甚多,恕不一一列举。还有铁器生产工具,也由蜀地大量运销到了云南,促使了云南农业生产技术的改善。王大道先生认为:“从那以后,云南地区和祖国内地的经济文化联系更加密切,中原先进技术迅速传入云南,为边疆人民所掌握。西汉中期云南的冶铁业就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从而铁器逐渐得到广泛的使用。”^⑥

西南丝绸之路在中外文化交流方面,也发挥了突出作用。英国历史学家霍尔说:“公元97年,从罗马帝国东部前来永昌的使节曾沿着这条路线旅行。”^⑦罗马等国的杂技艺人也随着庞大的使团来到了中国,作杂技艺术和幻术表演。《魏略·西戎传》记述大秦(古罗马)“俗多奇幻,口中出火,自缚自解,跳十二丸巧妙”,说大秦“又有水道通益州、永昌,故永昌出异物。前世但论有水道,不知有陆道,今其略如此”。^⑧从史料记载透露的信息看,罗马人很可能是先由海道至缅甸,然后由西南丝绸之路进入云南和四川,再前往中原的。来自罗马、中亚与西亚的杂技艺人和魔术师们,在西南丝绸之路沿途肯定,多次表演,在繁华的成都可能有过较长时间的停留。四川地区出土的一些东汉杂技画像砖上,便留下了他们的精彩表演画面。成都市郊出土的一方汉代“杂技饮宴图”画像砖,中间的一位“幻人”,便是外国魔术师表演吐火的造型(图十九);新都收集到的汉代“驼舞”画像砖(图二十),也是外来表演的生动写照。^⑨

① (汉)司马迁撰:《史记》卷129《货殖列传》,北京:中华书局校点本,1959年9月第1版,第3277-3278页。

② (东汉)班固撰:《汉书》卷91《货殖列传》,北京:中华书局校点本,1962年6月第1版,第3690页。

③ 伍加伦、江玉祥主编:《古代西南丝绸之路研究》,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年10月第1版,第6页。江玉祥主编:《古代西南丝绸之路研究》第2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第49页。

④ 刘世旭、张正宁:《四川西昌市东坪村汉代炼铜遗址的调查》,《考古》1990年第12期。

⑤ 王大道:《云南出土货币概述》,《四川文物》1988年第5期。

⑥ 王大道:《云南滇池区域青铜时代的金属农业生产工具》,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云南考古文集》,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第91页。

⑦ 霍尔著:《东南亚史》,中山大学东南亚历史所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出版。江玉祥主编:《古代西南丝绸之路研究》第2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第13-14、59-60页。

⑧ (晋)陈寿撰:《三国志·魏书》卷30《乌丸鲜卑东夷传》,北京:中华书局校点本,1959年12月第1版,第860~861页。

⑨ 高文编:《四川汉代画像砖》图四三、图四八,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7年2月第1版。



图十九：成都市郊出土“杂技饮宴图”画像砖



图二十：新都收集到的汉代“驼舞”画像砖

值得注意的是，早期佛教图像很可能也是由西南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佛教的传入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早期佛教图像的传播，二是佛经的传入与翻译。过去通常认为，佛教大约于西汉末经西域传入中国内地，到了东汉后期，由于汉王室的倡导，佛教信仰在中国才逐渐传布开来。虽然史料有汉哀帝时“口受浮屠经”的记述，但根据考古资料的揭示，早期佛教图像的传播，应早于佛经的传入和翻译。从四川出土的早期佛教造像看，早期佛像的传入显然应在佛经的传入与翻译之前。也就是说，佛教传入中国，首先传播的是佛教图像，其后才是佛经的传播。学术界以往对此并未深究，随着考古资料的增多和研究的深入，我们对此才有了越来越清晰的认识。从考古发现看，四川地区发现的崖墓石刻佛像，以及出土摇钱树座与树干上的佛像（图二十一、图二十二），数量很多，为我们了解早期佛教图像的传播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①相较而言，中原地区发现的早期佛像则较少，时间也相对稍晚，^②也说明了早期佛教图像从印度传入四川的时间显然早于北方。四川早期佛教图像可能是从印度经缅甸、云南由西南丝绸之路传入蜀地的。四川早期佛教图像的出土地点，主要分布在西南丝绸之路干道上，而且呈现出向北方、向长江中游传播的趋势。邓少琴先生就指出：以往“对于佛教传入，后世所知，仅指北传南传，北通经西域以至中原，南传由海道以入吴楚，尚未提出西南一道，由掸国（今缅甸）以入蜀郡”，其实至迟在汉明帝永平十二年（69）袁牢王遣子内附之后，当时商贾往来，已有身毒之族携带蚌珠、珊瑚之类海产贩运其地，由于远涉崇山峻岭，而又有瘴气之厄，“不能不带有佛教之迷信，作为护符，以此辗转相习，经昆明、滇池，而至于蜀郡之西南”，史籍记述和文物遗存透露的信息，“说明在东汉安帝、桓帝之世，四川地区，为佛教初期之传入，是由西南商道，随商人信仰而来”。^③佛教后来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西南丝绸之路在传播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是不应忽略和忘记的，笔者对此曾撰有专文进行了探讨，此不赘述。^④

① 南京博物院编：《四川彭山汉代崖墓》第36-37页图44，彩图1，时代推断见第6页、97页、100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年7月第1版。参见唐长寿著：《乐山崖墓和彭山崖墓》图版15，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1993年8月第1版，第72-73页。参见阮荣春著：《佛教南传之路》，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第21页。何志国著：《汉魏时期摇钱树初步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年10月第1版，第43-45页。

② 俞伟超：《先秦两汉考古学论集·东汉佛教图像考》，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6月第1版，第167-168页。参见杨爱国《不为观赏的画作——汉画像石和画像砖》，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8年7月第1版，第214页。

③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重庆博物馆编：《邓少琴遗文辑存》，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10月第1版，第196-197页。

④ 黄剑华：《略论早期佛教图像的传播》（修订文本），刊载于《中原文物》2014年第1期，第48-56页。参见黄剑华：《略论早期佛教图像的传播》（全文本），载于《吴越佛教》第八卷，北京：九州出版社，2013年7月第1版，第421-438页。



图二十一：彭山东汉崖墓出土陶质摇钱树座上的佛像



图二十二：乐山麻浩东汉崖墓中的坐佛图

蜀汉时期,诸葛亮南征是蜀滇关系中一件非常重要的大事。秦汉时期,西南夷多民族杂居的情况比较复杂,汉代对西南夷的开拓与治理,譬如汉武帝派唐蒙开牂柯道及司马相如出使巴蜀略通邛笮等地,以及平定南越、夜郎等,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整体来看还是相对有限的。这种状况在三国蜀汉时期开始出现了较大变化,《三国志·蜀书·后主传》说诸葛亮南征越嵩、益州、永昌、牂柯四郡,“丞相亮南征四郡,四郡皆平。改益州郡为建宁郡,分建宁、永昌郡为云南郡,又分建宁、牂柯为兴古郡”,^①加上朱提郡、交州等,当时统称为南中。可见西南夷地区在三国时期已正式纳入蜀汉政权的版图,蜀汉政权分郡而治,设官置守,使南中成了蜀汉名副其实的大后方。

诸葛亮早在辅佐刘备之初就提出了“西和诸戎,南抚夷越”的方针,^②可谓高瞻远瞩,见识深远。但南中的情形比较复杂,要使西南各部族服服帖帖接受蜀汉的管辖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刘备病故后,南中诸郡就发生了叛乱。当时越嵩郡的豪强杀掉了守郡将军,益州大姓也杀害了太守,如“越嵩叟帅高定元杀郡将军焦璜,举郡称王以叛。益州大姓雍闿亦杀太守正昂。更以蜀郡张裔为太守,”又被雍闿“执送裔于吴。吴主孙权遥用闿为永昌太守”,还有牂柯郡的朱褒也叛乱,自领太守任意胡为,可见情形是非常严重的。《华阳国志·南中志》说,诸葛亮以初遭大丧,未便加兵;到后主建兴三年,诸葛亮已经稳定了蜀中形势,并同孙吴恢复了联盟友好关系,这才亲自率军南征越嵩、益州、永昌、牂柯四郡。关于诸葛亮南征的进军路线,曾有不同的认识和说法,据学者们研究,诸葛亮率领的主力应该是自犍道由水路进入越嵩,^③并派遣马忠率部进入牂柯,命令驻守和平夷县的李恢进兵益州,分兵合击,讨伐叛乱,很快就取得了决定性的军事胜利。诸葛亮南征过程中采取了恩威并用的策略,比如孟获是一位很有影响的少数民族首领,战败被擒后很不服气,诸葛亮又放他回去,凡七纵七擒,终于使孟获心服口服,说“明公,天威也,南人不复反矣”,^④南中地区大小诸夷从此不复叛乱。

诸葛亮平定南中后,为了巩固获得的胜利,采取了一些很重要的策略和措施。首先是在行政上加强了对南中的治理,将益州郡改为建宁郡,分建宁、越嵩、永昌郡中的部分县设置了云南郡,又分建宁、牂柯郡设置了兴古郡,南中自此分为六郡,使南中各郡县的划分与设置更加精简合理,同时

① (晋)陈寿撰:《三国志》卷33《蜀书·后主传》,北京:中华书局校点本,1959年12月第1版,第894页。

② (晋)陈寿撰:《三国志》卷35《蜀书·诸葛亮传》,北京:中华书局校点本,1959年12月第1版,第913页。

③ (晋)常璩撰,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10月第1版,第243-244页。

④ (晋)陈寿撰:《三国志》卷35《蜀书·诸葛亮传》,(南朝)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北京:中华书局校点本,1959年12月第1版,第919、921页。(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修订版),成都:成都时代出版社,2007年6月第1版,第182、183页。

任命了几位能干的太守,分管南中各郡行政、军事事务;其次是重用南中的人才。常璩说诸葛亮平定南中后,“收其俊杰建宁爨习、朱提孟琰及获为官属,习官至领军,琰辅汉将军,获御史中丞”。孟获、爨习、孟琰等人都是南中地区的代表性人物,诸葛亮将这些南中的俊杰人才任以官职,加以重用,不仅团结了南中地区的大姓富豪,也笼络了西南夷各族的民众人心,有效地加强了对南中各郡的管辖和治理;再者是收编了南中的人马,扩充了蜀汉的兵力,“移南中劲卒青羌万余家于蜀,为五部,所当无前,号为飞军”,青羌兵骁勇善战,后来成为诸葛亮北伐部队中的一支劲旅。诸葛亮还“分其羸弱配大姓焦、雍、姜、爨、孟、量、毛、李为部曲;置五部都尉,号‘五子’,故南人言‘四姓五子’也。以夷多刚很,不宾大姓富豪,乃劝令出金帛,聘策恶夷为家部曲,得多者奕世袭官。于是夷人贪货物,以渐服属于汉,成夷、汉部曲”,并“出其金、银、丹、漆、耕牛、战马给军国之用”,^⑤充分利用南中的人力、物力,补充和加强了蜀汉的力量。

诸葛亮在南征过程中,对加强汉夷文化交流也做了很多事情。诸葛亮平定南中之后,还加强了对南中的开发,将很多先进的生产技术与文化输入到了南中地区。《华阳国志·南中志》说诸葛亮看到南中诸夷虽有口头相传的“夷经”,却缺少文字记载,还停留在“投石结草”的阶段,民俗、民风也比较落后,“其俗征巫鬼,好诅盟”,好用占卜与结盟的方式来处理事情。“诸葛亮乃为夷作图谱,先画天地、日月、君长、城府;次画神龙,龙生夷,及牛、马、羊;后画部主吏乘马幡盖,巡行安恤;又画[夷]牵牛负酒、赍金宝诣之之象,以赐夷。夷甚重之”,“又与瑞锦、铁券,今皆存”。^①诸葛亮对西南各部落的民俗、民风因势利导,将汉文化传播到了南中诸夷各地,并将内地先进的生产方式与织锦技艺带到了南中,不仅对改变南中落后的文化面貌与生存状态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也促进了汉族和西南夷各族的团结。诸葛亮的这些做法,促进了南中地区的文化进步与生产发展,加强了南中地区与内地的融合。诸葛亮在南中地区的威望很高,影响巨大,所以南中各族人民将功绩都归于诸葛亮,比如南中地区流行的铜鼓,民间口碑流传都传说是诸葛亮制作的,皆称为“诸葛鼓”,一直沿袭至今。^②还有南中地区一些与诸葛亮相关的地名或遗迹,大都附会有诸葛亮平定南中时的故事。诸葛亮将蜀锦与织锦技艺也带到了南中地区,使南中民众也学会了织锦,除了满足当地各族人们的生活需求,很可能还要将生产的锦缎贡赋给蜀汉政权,因而增加了蜀汉财政收入来源。现在云南等地的“侗锦”、“武侯锦”、“诸葛锦”之类,就是从诸葛亮平定南中之后流传下来的。

诸葛亮南征七擒孟获、平定南中的故事,在后世一直传为美谈。后来很多著述典籍中都加以引用和记述,如《水经注》《蛮书》中都记述了诸葛亮“五月渡泸”、“讨平南中”的地理路线与征战史实,^③《寰宇记》《方輿纪要》等志书也都有记载。洪迈《容斋随笔》卷四说“蜀刘禅时,南中诸郡叛,诸葛亮征之。孟获为夷汉所服,七战七擒,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复反矣”。后世依然顺服,“乃知南夷心服,虽千年如初。呜呼,可谓贤矣”,^④对诸葛亮平定南中的深远影响表达了由衷的赞叹。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说“云南古为荒服,自汉以来乍臣乍叛,盖疆域辽阔,夷落环伺崇山巨川,足以为保据之资,故时恬则牛驯蚁聚,有事则狼跳虎噬,势固然也。西南一隅,反复最多”。“诸葛武侯欲专意中原,虑群蛮乘其后,乃先南讨”,充分肯定了诸葛亮的深谋远虑。书中还记述了诸葛亮南征时留下的一些遗迹,例如宜良县有“诸葛洞,在县南小石岭,诸葛武侯南征时尝置营于此,亦名诸葛营”。又如

① (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修订版),成都:成都时代出版社,2007年6月第1版,第185、186页。

② (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修订版),成都:成都时代出版社,2007年6月第1版,第188~189页。

③ (晋)常璩撰,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10月第1版,第253页。

④ (北魏)酈道元撰、王国维校:《水经注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5月第1版,第1119~1120、1125、1153页。参见(唐)樊绰撰:《蛮书》卷2,成都:巴蜀书社,1998年10月第1版,第7页。

⑤ (宋)洪迈撰:《容斋随笔》卷4《南夷服诸葛》,《笔记小说大观》,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影印本,1983年6月第1版,第6册第153页。

剑川州有“诸葛池,州北四里,相传武侯饮马处”。^⑤这些记述与评论,都反映了诸葛亮平定南中的意义与影响。



图二十三 云南普洱市内的诸葛亮塑像

总而言之,诸葛亮成功平定南中,不仅增强了蜀汉政权的势力,同时也加强了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管辖和治理,有效地促进了汉族和西南夷各族的团结与融合。由此可知,诸葛亮平定南中并不单纯在军事战略上取得了重大胜利,在政治上、文化上和社会生活诸多方面也做出了重要建树,其意义是非常深远的。现在云南普洱市等地建有诸葛亮塑像(图二十三),就表达了后世对诸葛亮的敬仰和纪念。

四、结 语

我国西南地区部族众多,是典型的多民族地区。蜀与滇因为地域相邻,自古以来就关系密切。古蜀可能是西南地区最早创建的一个联盟之国,或称为宗主国。春秋战国时期,古蜀国的东方有巴国与楚国,北方有秦,这些都是当时势力比较强盛的列国。而在同时期的西南夷区域,夜郎与滇等依然是小邦,或者是“邑聚”之类的部族。古蜀国通过商贾与周边少数民族进行贸易以获取资源,此类商贸活动既有短程也有远程,产自于古蜀国的丝绸、青铜器、巴蜀的盐巴,以及其他很多物品,便通过商贸输入了滇国和西南夷地区,有些物品甚至经过远程贸易辗转贩卖到了南亚和中亚。与此同时,古蜀国成熟而高超的青铜铸造技术,也在商周之后随着商贸传入了滇国和西南夷地区。汉武帝大力经略西南夷,到东汉时期西南丝路已成为重要国际通道;后诸葛亮平定南中,有效地促进了汉族和西南各族的团结与融合,其意义是非常深远的。

(责任编辑:吴树生)

^⑤ (清)顾祖禹撰:《读史方輿纪要》,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第719、720、733页。

The Cultural Relations between Shu(蜀)and Dian(滇)

Huang Jianhua

(Sichuan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rchaeology, Chengdu Sichuan, 610041)

Abstract: There are many tribes in the southwest of China, which is a typical multi-ethnic area in the east of the world. Shu and Dian are adjacent to the region and have been closely related since ancient times. Ancient Shu may have been the first country in the southwest to create a union, or the state of the country. During the Spring and Autumn Dynasties, the eastern states of ancient Shu had the state of Pakistan and the state of Chu, and the north had Qin. In the same period of the southwest, the Yelang and Dian, are still small states, or the tribe of "cognac". Trade with the ancient Shu kingdom by merchants and the surrounding minority in access to resources, such commerce has both short-range and long-range, come from the ancient Shu kingdom of silk, bronze ware, BaShu salt, and many other items, then through trade enter the Yi Dian kingdom and southwest region, some items after a long-distance trade and sold to the south and central Asia. At the same time, the mature and superb bronze casting technology of the ancient Shu state was also introduced to Yunnan and the southwest after the Shang and Zhou Dynasties. Emperor Wudi of the Han Dynasty, the southwest of China, to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international channel. Later Zhuge Liang pacify Nanzhong, effectively promoted the unity and integration of the Han and the southwest ethnic groups, and its significance was very profound.

Key words: Ancient Shu; Southwest Yi; Dian kingdom; Monsieur beaucaire states; Nanzhong; Regional culture; Ethnic fusion